

诺 / 贝 / 尔 / 经 / 济 / 学 / 奖 / 获 / 得 / 者 / 丛 / 书

*Library of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 交易费用政治学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道格拉斯·C·诺思 (Douglass C. North)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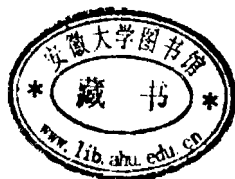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Library of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 交易费用政治学

##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道格拉斯·C·诺思 (Douglass C. North) 等著  
刘亚平 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易费用政治学/ (美) 诺思等著; 刘亚平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ISBN 978-7-300-16882-1

I. ①交… II. ①诺…②刘… III. ①交易-费用-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14. 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6924 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交易费用政治学

[美] 道格拉斯·C·诺思 等 著

刘亚平 编译

Jiaoyifeiyongzhengzhixue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张	26.7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7 000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序

20 世纪 80 年代，交易费用经济学开始被运用来研究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1981 年，诺思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sup>①</sup>。在此书中，诺思开始关注制度的低效率及其原因，并建立了一个新古典国家理论，将交易费用视为一个理解国家行为的变量。1990 年，诺思发表了一篇名为《交易费用政治学》<sup>②</sup> 的论文，标志着交易费用政治学正式诞生。在此之前，莫和温加斯特就已经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来分析政治问题。<sup>③</sup> 在这些先驱性探索的基础上，10 余年后，这个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文献，一个可以称之为交易费用政治学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出现。由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运用，很多政治学和公共选择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比如，理性的选民为什么选择投票？政治委托人能否有效控制官僚机构？议会是如何作出授权决策的？如何有

---

① Douglass C. North,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② Douglass C. North, 1990,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 355-367.

③ Terry Moe,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739-777.

Barry Weingast, 1984, The Congress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A Principal Agent Perspective, *Public Choice*, Vol. 44: 147-191.

效地克服政治机会主义？议会内部为什么会发展出委员会体制？为什么有些公共服务只能在公共官僚机构内部生产？如何评价政治市场的效率？为什么国家之间会采取不同的合作形式？政治交易中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设计？本书选编了发表在各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的最重要的 15 篇文章，集中出版，希望帮助中国学者了解该领域的发展。

正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指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及其合同，任何能够描述成为合同问题的关系都可以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sup>①</sup>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这些政治交易都是可以从合同的角度来考察的。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政治家（议会或行政首脑）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政治家之间的政治交易也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事实上，许多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者都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政治合同的概念。在政治交易中，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合同都是隐性合同。政治合同的这种特性使得政治合同的制定和实施都会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问题，主要是制定合同时的高昂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以及合同实施的风险。这些交易费用问题（合同问题）都会影响到政治交易以及政治制度的设计。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政治问题的框架。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很多发现大大地弥补了以前的以公共选择为主的理性选择政治模型的缺陷。早期的理性选择模型忽略了政治制度的作用，把政治制度当作外生变量给定，政治分析只是分析在给定的政治制度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行动者是如何决策和行动的，而不能解释（也没有兴趣解释）这些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交易费用政治学将制度分析包括进了理性选择模型中，从而，许多在传统理性选择模型那里不能解释的政治行为，现在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此外，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分析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将一些以前研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重新引入政治分析

---

<sup>①</sup> Oliver E. Williamson,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中。最后，相当多的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研究重点。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理论重心的“误置”。这种误置大大地限制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运用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重新确立为国家之间的交易，使得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在目前的全球化体系中迅速变化的政治结构。

当然，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首先，正如早期的经济领域的制度分析主要关注制度的有效率的一面那样，目前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也是主要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有效率的一面。这种分析有两个问题：（1）如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机会主义行为；（2）政治领域的竞争是否充分到能够引导政治家去设计降低交易费用的政治制度。其次，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几乎都集中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体系方面，这就为理论建构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这样的理论只是建立在有限的经验事实的支持之上的，理论本身的概括度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果将政治制度安排视为交易费用政治模型中的因变量，而交易费用或者引起交易费用的那些因素视为自变量的话，那么，这种从有限的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型实际上要么将某些自变量当成了常数，要么将因变量当成了常数。再次，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都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因而都集中分析政治制度如何将交易费用最小化。虽然在经济领域运用效率标准基本上是争议不大的，但在政治分析中完全关注于效率标准则不能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很多政治制度最初的设计动机都是非效率的，例如正义与平等。最后，现有的文献实际上指出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运用交易费用理论的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以交易费用作为关键概念的分析、以低程度和高程度的激励为核心的分析、以合同为核心的分析。对于交易费用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来说，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

毫无疑问，交易费用政治学已经出现。它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其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新兴起的研究领域，它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为了进一步推动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发展，必须关注政治制度的非效率的一面，并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放到更加

广阔的经验世界中去，充分利用比较政治学累积起来的资料与数据，从而建立起概括范围更广、概括程度更高的理论。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赖于在政治学家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之间形成某种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与沟通。对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政治学家应该更加开放，而不能因为反对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拒绝经济学的理论。而经济学家也应该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政治学累积起来的资料与理论。

马 骏

# 目 录

一	交易费用政治学	道格拉斯·C·诺思	1
	(一)		2
	(二)		4
	(三)		8
	(四)		10
二	政治科斯定理：新古典制度主义与 批判制度主义的区别	巴斯卡·维拉	14
	评估制度绩效		15
	解释制度变迁		18
	政治科斯定理？		23
	结论		27
三	新组织经济学	特里·M·莫	34
	组织的经济理论		35
	应用于公共官僚制		54
	结论		69
四	超国家结构的设计：经济学的视角		
		托德·桑德勒 乔恩·考利	74
	公共物品		75
	交易成本与交易收益		79
	联结与超国家结构设计：“单对”的例子		81



超国家系统设计：“N对”的例子 .....	85
技术的作用与超国家主义 .....	86
结论 .....	87
<b>五 作为治理结构的宪政：安全市场的政治基础</b>	
..... 巴里·R·温加斯特	92
(一) 导言.....	92
(二) 联邦制的政治理论.....	96
(三) 实践中的市场维持型联邦制.....	98
(四) 英国公民社会的演化 .....	101
(五) 英国的市场维持型联邦制与法治 .....	107
(六) 结论 .....	109
<b>六 统治的掠夺理论</b> .....	玛格丽特·利维 121
马克思主义和微观经济学的贡献.....	122
统治的掠夺理论.....	124
统治权力的获得和维持.....	127
国家政策.....	131
经济利益的变化.....	140
国家边界的变化.....	143
结论.....	145
<b>七 西欧专制主义国家政策之形成：</b>	
<b>英国和法国的比较</b> .....	埃德加·凯泽 161
在西欧专制主义国家中君主自主性的决定因素.....	162
阶级和君主的利益与国家政策偏好.....	166
统治阶级理论.....	171
国家主义理论.....	173
均衡理论.....	174
案例.....	176
结论.....	186
<b>八 民族和国家：统一与征服、分裂与脱离</b>	
..... 唐纳德·威特曼	201
(一) 效率解释 .....	201
(二) 历史例证 .....	203
(三) 结论 .....	205

<b>九 组织理论和财政经济学：社会、国家与公债</b>	
..... 维克托·范伯格 詹姆斯·M·布坎南	207
(一) 导言 .....	207
(二) 作为组织的国家 .....	208
(三) 公债和私人请求权 .....	209
(四) 公债的影响：负担问题 .....	211
(五) 团体借债的原则和机会成本 .....	212
(六) 公债和作为组织的国家 .....	214
(七) 退出、呼吁和民主国家 .....	215
(八) 有限国家和宏观经济政策理论 .....	217
<b>十 国会的工业组织，或者为什么国会像企业一样并没有按 市场方式来组织</b> .....	巴里·R·温加斯特 威廉·J·马歇尔 221
(一) 新组织经济学 .....	223
(二) 代表和选民 .....	224
(三) 来自交易的收益：要解决的问题 .....	225
(四) 立法委员会制度 .....	230
(五) 证据：偏好、影响力和委员会收益的分配 .....	234
(六) 比较静态：预测和证据 .....	240
(七) 结论 .....	241
<b>十一 控制的成本：立法者、代理人和交易费用</b>	
..... 约翰·D·休伯 查尔斯·R·希潘	254
什么是官僚控制的交易费用途径.....	255
立法组织的解释性说明.....	258
对解释性说明进行解释.....	262
交易费用对于控制制度的影响.....	265
新的理论方向.....	268
交易费用途径和比较政治学.....	269
结论.....	271
<b>十二 公共部门的规则与治理：以公务员制度为例</b>	
..... 霍华德·弗兰特	280
导言.....	280
公务员制度与政治家.....	284

解释公务员制度：一些证据	288
市民或政治家？	290
结论	294
<b>十三 作为政治控制工具的行政程序</b>	
..... 马修·D·麦卡宾斯 罗格·G·诺尔 巴里·R·温加斯特	299
(一) 官僚服从问题的解决方案	302
(二) 对服从问题的程序性解决	308
(三) 在具体政策情景下的事先安排	318
(四) 国会、总统和法院	326
(五) 结论	327
<b>十四 政治制度：被忽略的一面</b>	特里·M·莫 335
(一) 政治学、经济学和组织	337
(二) 公共权力和政治制度	342
(三) 公共权力和有效组织	345
(四) 公共权力和政治不确定性	346
(五) 公共权力和政治妥协	348
(六) 公共权力、自主性和对国家的惧怕	350
(七) 总统和议员	355
(八) 权力的分立和议会制度	357
(九) 一些关于议会体制的（热闹的）思考	361
(十) 结论	367
<b>十五 公共与私有官僚：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b>	
..... 奥利弗·E·威廉姆森	377
(一) 交易费用政治学？	379
(二) 交易费用经济学：概要	382
(三) 矫正性标准	385
(四) 公共部门的交易	389
(五) 主权型交易	391
(六) 用私有官僚组织来取代？	400
(七) 评论	407
(八) 结论	410

# 一 交易费用政治学\*

道格拉斯·C·诺思

政治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已经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运用到政治学当中。这些假设包括工具理性和（通常是隐性的）有效市场的理念。<sup>[1]</sup>我认为，对这两个假设不加批判地接受已经使政治理论迷失了方向。交易费用政治学是建立在这些假设之上：信息是有成本的；行动者解释他们的环境是基于主观模型；合同的不完全实施。采用这样的模型而进行的选择造成高昂的政治交易费用，致使政治市场非常不完善。我认为，将标准理性选择模型整合进交易费用理论之中，能够极大地提高该模型的解释力，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所观察到的政治市场。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详细说明和描述行为和信息成本假设，它们构成了工具理性和随后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制度世界的基础，并且把这些假设与支撑制度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假设进行对比。其次，将讨论政治市场的特征，描述政治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和形成政治选择时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最后，探讨交易费用框架对于政体和经济绩效的意义。

---

\* Douglass C. North, 1990,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 No. 4: 355-367.

## (一)

工具理性意味着行动者或者有正确的模型来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或者收到反馈信息，使他们可以修改或更正最初不正确的理论。竞争性市场是社会的特征，不能构建正确理论的行动者和他们的组织将在这种市场中毁灭。赫伯特·西蒙将工具理性的内涵精确地概括如下：

如果我们把价值当做是给定的和不变的，如果我们假定对世界的客观描述与真实世界一样，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那么会产生以下两个重要的推论。第一，我们无须分辨真实世界和决策者所感知的世界，（因为）他认识的世界就是真实世界；第二，我们可以完全根据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无须了解决策者的感知或计算模型，来预测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将会作出的选择（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效用函数）（Simon, 1986: S210）。

将工具理性途径运用于政治学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贝克尔（Becker, 1983）的政治竞争模型。这一模型在决策过程中剔除了明确的行动者和制度（选民、议员、立法机构和决策规则），但没有剔除交易费用（因为“搭便车”和无谓损失都包括在模型中）。它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博弈，其中给予一部分人的补助为其他群体所缴纳的税赋所补偿，但由于存在无谓损失，税赋的增长比补助要快。由于纳税人的成本将比受补助者的收益增长得更快，因此，再分配将是有限的。贝克尔模型的漂亮之处在于它把导致结论的假设完全展现出来（事实上，所有好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模型都是这样的）。导出结果的两个关键假设是参与者（在这个例子中指那些纳税人）能够清楚地识别出收入损失的原因（即那些受补助者），以及他们有平等的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

当然，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明确识别出征税原因是容易的，因为所进行的都是再分配博弈。而且，只要政治政策是这一类型的，纳税人事实上就可以知道谁要对他们的损失承担责任。由于现代政

府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转移支付，因此这一模型关注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立法类型，其中，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就能够获取关于所发生事情的信息。

但是，政治市场远远不仅是明确的再分配，而是潜在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经济的激励结构——产权、契约行为和可信承诺。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不仅需要信息，还需要理论来解释确立或变更产权、界定国际关系、决定价格和就业波动等政策的结果。这些政治市场以不完全信息、主观模型和高昂的交易费用为特征。此外，即使在贝克尔模型最鲜明的例子——转移支付中，也存在相当高的交易费用，受影响的一方消息不灵通，而且并非所有受影响的各方都有进入决策制定程序的平等渠道，这一点贝克尔自己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也认识到了（Becker, 1989）。况且，撇开转移支付不论，公开的再分配是非常罕见的，原因正是在于其透明性。在美国，付钱给农民以使其不从事生产的农产品价格补贴议案（farm price support bills）从来没有成功过，原因只是该议案太明确了。大多数立法都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立法中，再分配要么是隐蔽的，要么是其他目的的副产品。无论哪种情况，即使是议案的发起者也无法知道所有的结果，更不用说选民了。

从认为 1763 年以后的英国政策正在破坏殖民地经济的美国殖民地居民，到认为农场的贫困是铁路、谷物仓库、垄断者和银行家造成的 19 世纪末的农民，到那些对决定蔗糖及其替代品价格的控制网只有极其模糊概念的现代美国蔗糖消费者（Krueger, 1988），政治市场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一个这样的市场：行动者并不完全理解影响他们的事件，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着有效解决方案的产生。

上述例证中，缺乏的是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政策结果的可靠理论。事后我们知道，英国的政策并没有毁掉殖民地（实际上，加拿大在英国的体制下发展得很好）；农民拥护的平民党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缓解他们的贫困；而美国的消费者和主要的行动者永远也不会理解拜占庭式的蔗糖控制史，这些消费者经常支付比世界高出两倍的价格来买蔗糖，而主要的行动者往往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政策的结果（在本例中指蔗糖替代品的发展和相对价格）。

蔗糖的政治市场突出了理性选择理论所忽视的两个关键问题：指导我们行为的不完全模型，以及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无法即

使是大致地形成更有效的市场。克鲁格对蔗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各种利益的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知道他们的利益？其次，从政治的设计本应是使所有相关人的境况都有所改善的意义上来看，集体结果是理性的吗？”（Krueger, 1988: 38）她详尽地列出了被认为知识渊博、有权势、有利益关系的政党所犯的无数错误。政党不但追求错误的政策，而且也没能采取一些明显会使其境况改善的政策。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政策朝着可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方向发展。相反，渐进式政策变更产生新的利益集团压力，它们无情地进一步推进拜占庭政策。克鲁格总结道：

首先，在1934年最初制定这一政策时，以及后来在1948年恢复该政策时，其鼓吹者的意图与二三十年后该政策所致力的目的大相径庭。其次，要选民支持一个向每个农场补贴136 000多美元的政策，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这一数字被广泛公开的话。最后，至少有一些蔗糖政策的支持者——彻底破产的粗糖进口商和加工商、甜菜厂厂主——如果早知道政策结果的话，不会那么热心地支持该政策（Krueger, 1988: 54）。

拜占庭式蔗糖市场政策所以产生的两个潜在原因是：行动者不完全明白他们行动的结果；政治市场的特定制度安排增加了交易费用，使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成为不可能。在这部分中，我们已经探讨了第一个问题——工具理性。现在，我转向第二个问题：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然后，我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考察政治系统的总体特征。

## （二）

现存的最有效率的政治市场是民主政治中的立法机构——在本例中即美国国会。为理解这一政治市场的特征，有必要考察决定其交易费用的制度母体。现代代议制民主中，制度结构的设计是为了方便（给定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交易。<sup>[2]</sup> 政治结构反映了位于某地并具有特殊利益的选民的关注点。这样，在美

国的体制下，有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的老年人，有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的矿工，有加利福尼亚的向日葵种植者，有密歇根的汽车制造商，等等。因为存在多元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由议员所代表，而议员只是关注自己选区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一个议员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能够形成多数。因此，议员单独行动是无法成功的，而必须与其他的、具有不同利益的议员达成协议。

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议员之间的交换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制度呢？早期的研究始于布坎南和塔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他们关注的是选票交易或换票行为（vote-trading or log-rolling）。当然，认识到议员能够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交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然而，要解决立法交换中涉及的根本性问题，这一途径还过于简单。它假定，所有的议案和收益都是事先知道的，而且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但事实上，许多交易都是这样产生的，即以未来的承诺来换取今天的法律通过。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必须设计一套容许超越时空交易的制度安排。注意它与经济交易的相似之处：它们的问题都在于测量和实施交易权。

当收益是在将来发生，而且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时，可信承诺是如何形成以促成合同的呢？在这种交易中自实施（self-enforcement）非常重要，并且在重复交易中，声誉是非常重要的资产。但是，与经济交易一样，测量和实施的成本、发现谁在欺骗谁、什么时候会出现“搭便车”，以及谁必须承担惩罚背叛者的成本，使自实施在很多情况下无效。因此，政治制度构成政治家之间关于合作的事前合同。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交易结构，制度减少了不确定性。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委员会结构体系，包括组织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方法。温加斯特和马歇尔在《国会的工业组织，或者为什么国会像企业一样并没有按市场方式来组织》一文中研究了这一体系在美国国会中的发展。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温加斯特和马歇尔说明了所出现的结构。

议员们交换的是特殊的权利而不是选票，这种交易赋予权利拥有者对某一明确政策区域的额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源于建立在议程机制（agenda mechanism）之上的产权，这是投票的选项所产生的方式。对特定政策的额外影响使得一种具体的交易模型制度化。当委员会席位的持有者正是那些在选票市场



上就这些问题竞标的人时，委员会制下的政策选择就类似于更明确的交易系统。因为交易被制度化，所以不需要在每次新的立法会议上重新进行协商，而且也更少面临实施上的问题。（Weingast and Marshall, 1988: 157）

上文说明了一套制度是如何促进政治交易的。美国国会相对较低的交易费用（也因此比较有效率）得益于精心设计的制度结构，它使非同一时间的交易变得容易，并使可信承诺成为可能。虽然制度结构使立法机构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政治市场是有效率的，只是立法机构的制度框架有利于低成本的交易。整个政治市场的效率要看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接近零交易费用。

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将是这样的：选民能够根据政策对其福利的净影响来精确地评估竞选者所追求的政策；只有使受交易影响的各方的总收益最大化的立法（或管制）才能通过；而对那些受交易损害的人进行补偿将能保证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一行动中受损。

为此，选民和议员要有正确的模型，使他们可以准确地评估不同政策的得失，议员要为选民的利益投票，也就是每个议员要根据选民的净得或净失来衡量其选票，而且受损者将会得到补偿，以使交易对他们而言是值得的。所有这些都要支付交易费用，但净总收益仍是最高的。

议员所进行的中间行为——就他所认为符合选民利益的议案进行投票，并粗略地根据所观察到的选民的净得或净失来衡量这一投票——可能有时近似于上面所描述的复杂立法结构中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让我们看一下有效政治市场的其他必要条件。

（1）选民怎样知道他的利益？竞选者实际上会怎么做呢？竞选者被召集来就各种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选民福祉的议案进行讨论和投票，即使他们对这些议案也不甚了解。而且，即使他们了解，他们也必须要知道议案对选民福祉的影响——如果是明显的再分配，或者是直接影响某地区的收入和就业的议案，要知道对选民的影响也许很容易，但是对大部分议案而言，要知道其影响却是很难的。至于选民，他们必须知道代表们所通过的众多议案的结果，及其对个人的影响。

（2）立法机构的制度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零交易费用模型